

语言的功能与修辞学研究

——逻辑修辞学初探

王 中 和

修辞学界,不少同志现在认为修辞学是一门“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”^①;实际是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:修辞学应该现代化。如何使我国修辞学研究向现代化方向发展?关键在于全面地理解语言的功能,从而弄清什么是修辞过程,什么是修辞现象,才能科学地确定修辞学研究对象,明确修辞学的研究功用。

语言的功能有哪些呢?与修辞学研究的关系怎样呢?

一、语言有统一着的交际功能和思维功能,它是人类交际和思维最主要的工具;而修辞学要研究“语言·思维”这统一体运动中的信息加工质量和表达效果。

语言与思维的关系,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,也是一个普遍性的实际问题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,从语言的起源上,宏观地论述了语言交际功能与思维功能的统一。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先生用“语言·思维”^②来表达语言与思维这两种不同社会现象之间的密切关系。我们知道,在从猿向人演化的过程中,原始人经历着从非分节语向音节语的漫长发展。非分节语的特点,是缺乏明显分化的、相互对立的语音单位系统。原始人只能用这种含混不清的音组,同描绘性手势所体现的指示义相配合,反映大体明确的一组同类对象、现象、动作等,被直接感知而获得的知觉表象。这只是同高级灵长类动物的本能反应,有量的差异而没有质的区别的“形象思维”,严格地讲,还不能算什么“思维”。随着原始人劳动水平进入较高阶段,实践所涉及的对象范围愈来愈扩大,从以自然物为工具,发展到制造劳动工具进行社会生产,男女之间出现了劳动分工萌芽,言语活动才开始逐渐脱离同交往客体的直接联系,而获得相对的独立性,要求音组更加丰富,声音愈来愈具有细致的变调和音色差异,来准确规定它们同有关事物和现象的联系。非分节语发展到后期,逐渐分化为音节语,以词表达明确分化的概念,以句表达明确分化的判断,形成日趋完善的语音系统和词汇语法系统。人类以音节语为工具,才能进行抽象思维。可见语言和思维是同步发展的,交际功能与思维功能是统一着的。思维愈深刻,语言也愈精密。但是,我们不能以此就认为,人类有了抽象思维,形象思维就减退了,消失了;正好相反,音节语的形成和发展,促使人类形象思维发生了质变,形成不同于高级灵长类动物的,真正称得上是思维的形象思维。其高级阶段,就是艺术思维,文学创作的语言形象思维,就是其中的一种。音节语既是人类抽象思维的工具,也可以作为形象思维的工具。

修辞是语言的运用,不能撇开语言的思维功能,单就语言的表达功能而论,“材料配置定妥之后,配置定妥和语辞定着之间往往还有一个对于语辞力加调整、力求适用的过程;或是随笔冲口一晃就过的,或是添注涂改穷日累月的。这个过程便是我们所谓修辞的过程;这个

过程上所有的现象,便是我们所谓修辞的现象”。③传统修辞学的理论曾综合为两句话:“(1)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,就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;(2)修辞所适合的是题旨和情境。”④所谓“剪裁配置”过程,实际就是对收集的材料,进行分析、比较、舍取、综合的思维过程,即对所获的信息,通过推理或想象,进行加工,重新组合为新的信息体系的过程。如果把修辞过程,只看作是“写说发表”过程,撇开了语言的思维功能,那么“剪裁配置”如何能够明确呢?所须适应的“题旨情境”,又如何能够明确呢?写说者思维发展的过程,首先是发挥语言的思维功能,使题旨情境得以明确,才能决定“写说发表”的方式,这是内容决定形式;然后发挥语言的表达功能,采取相应的“写说发表”的方式,去适合题旨情境的需要,这是形式为内容服务。这才是修辞活动的完整过程。

从信息论角度看,语言交际的言语过程,是交际者双方的信息交流。其过程是:“信息输入(听阅)→信息译码(理解)→信息编码(加工)→信息输出(说写)→信息传递→信息输入(听阅)→信息译码(理解)→信息编码(加工)→信息输出(说写)……”不断交流循环的发展。

这个过程同一般计算机不同之处,是言语活动的双方,各自在大脑中,必须先由信息译码理解对方的信息内容,然后再经过信息编码加工自己的信息内容。从说写角度看,修辞过程存在于信息编码阶段;从听阅角度看,修辞效果的反映,存在于信息译码阶段。叶圣陶同志对“修辞立其诚”,有独到的见解:“想得认真,是一层。运用相当的语言文字,把想得认真的心思表达出来,又是一层。两层功夫合起来,就叫‘修辞立其诚’。”⑤“想得认真”,离不开语言,即必须发挥语言的思维功能;用语符列或字符列表达之前的“运用相当的语言文字”,应是指根据“想得认真”的要求,对语言的运用,发挥语言的表达功能。修辞过程,包括这两个相继的阶段。修辞学应当以语言统一着的交际功能和思维功能为依据,研究“语言·思维”这统一体运动中的信息加工质量和表达效果。

二、语言有统一着的表义功能与表情功能,它是人类达意和传情的最主要的工具;而修辞学要研究“语言·思维”这统一体运动中信息的表义手段和表情方式的规律。

从信息论角度看,语言是一种听觉符号体系。它是语音和语义的统一体。人们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同时,也反映主观对客观的评价,即情感。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,为什么既能达意,又能传情呢?关键在于交际功能与思维功能的统一,而不是“同一”,词义和概念并不完全相等。我们知道语言和言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,言语是说话人的行为和结果;语言是从言语中概括出来的规则的总和,它存在于言语之中。因此语义也相应地分为语言意义和言语意义。前者又可分为词汇意义、语法意义和逻辑意义;后者又可分为语境意义和修辞意义。我们可以根据词在语言意义和言语意义中是否带有感情色彩,把词分为表情词和非表情词。非表情词有两种:一是科学术语的本义词,即词所表达的概念内涵,它是词义的核心,是词的逻辑意义;二是关联词,它反映事物、现象之间的某些逻辑关系。表情词大体有四种:一是专门表达感情的叹词,它们虽然有相应的表情范围,但具体的表情还得在一定语境中才能最后明确;二是语气词,它们虽然也有相应的语气范围,但具体的语气表情,仍要在一定语境中,才能最后明确;三是褒贬词,它们的感情色彩,在词义中比较明确,但在具体语境中仍会产生一定变化;四是非表情词用于不同的语境、不同的语体,也会产生不同的感情色彩。例如“苦涩”的逻辑意义是“又苦又涩的味道”,当我们讲“她苦涩的表情”时,用了它的形容义,构成修辞中的移觉,就有感情色彩了。引申义、比喻义、形容义,原来是运用中的修辞意义,后来用多了,就成为词义中的转义了。

词义除了感情色彩之外,有的还具有形象色彩。它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和现象外在区别性

体现出来的物理、化学属性，通过感觉器官分析综合在大脑里的反映。这种反映具有一定形象感，词能将它们加以概括。例如占人脑获得信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视觉形象，是人的视觉器官，对眼所适宜的波长为370—740毫米的电磁波刺激的反映。人脑通过眼睛可以感受并分辨出光的强度和色泽，因而可以看清光体或反光体的形状、大小、轮廓、远近和表面细节。由于第二信号系统的作用，词对这些视觉感受的形象信息进行了抽象概括，并通过词的指谓性与第一信号系统联系，同一定对象相对应。这就是摹状词具有形象性的原因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根据词是否有形象色彩，把词分为形象词和非形象词。非形象词即非表情词，形象词可依不同感觉器官所获得的不同形象信息，分为视象词（如“红艳艳”）、声象词（如“轰隆隆”）、嗅象词（如“香喷喷”）、味象词（如“甜津津”）、动象词（如“颤抖”）、触象词（如“平滑”）等。形象词在运用时，除反映有关对象的性状外，还能表达感情。如“阴森森”是视象词，表达“惧怕”的心理情绪，“龟缩”是动象词，表达了贬义的感情。形象词是文学形象思维的主要工具。文学家发挥形象词的显象功能，通过创造性想象，构成生动的画面，并与非形象词一起进行语言形象思维，完成文学作品的创作。

再从有声语言符号体系——语音体系和语义体系的构成及它们的关系来研究。语言听觉符号体系在言语中形成线性的语流程，它是语义组合和语音组合的统一体，由词、而短语、而句、而句群、而段落、而篇章。语流程前后之间的联系、对应和语流程的总貌，形成狭义的语境，其中有语法、逻辑、修辞的具体要求，和由此而出现的语体、文风、风格。狭义的语境又存在于广义的语境——时代背景、社会场合、交际范围等之中。广义语境对狭义语境起着制约作用，狭义语境以自己语言手段的运用，体现广义语境的要求。言语活动是在一定语境中进行的，所以，从修辞角度，可以根据语义是否在语境中引起变化，把语义分为情境义和非情境义。非情境义即词的概念内涵；情境义是言语活动中产生的修辞意义，如转义、转性、反语、拈连、移就、语义双关、类比喻义等。同义位的词的集合，构成语义场，如“写”、“说”、“读”、“想”这类动词，要求义位是“人”的名词作主语，如果在一定语境中，用了非人名词作主语，就构成拟人。

语音体系除了具有物理、生理自然属性外，还有民族、心理的社会属性。语音只有同语义结合，才有社会意义。音素是语音的最小单位，从音素的社会属性来研究语音，产生了音位学。音位是能区别词的语音形式和意义的最小单位。音位和义位有相应的联系。在实际言语活动中，人们以音节构成的词为最小单位，在进行语义组合的同时，进行语音组合。不同民族语言要充分发挥其语音各要素的作用，为表达语义服务。例如汉语的双声、迭韵、平仄等是汉语语音体系的特性，即使协韵、音步、节奏等也与非汉语不尽相同。朱自清先生认为韵律的利用“可以帮助情感的强调和意义的集中”^⑥，语音的和谐美、回环美、抑扬美、匀称美，在表义的同时，都可以表情。

总之，作为民族性的语言同作为人类性的思维，有本质相同的基础，即都有概括性、抽象性；这正是不同语言能够通过翻译，相互理解的依据。词义中的逻辑意义是词义的核心，发挥着表义功能。词义还可以大于概念，有感情色彩、形象色彩，语言的物质外壳——语音还有音乐性，语言在运用中还有语境意义。这些在表义的同时，具有表情功能。修辞学要研究“语言·思维”这统一运动中信息的表义手段和表情方式的规律。

三、语言有统一着的称名功能与指令功能，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不可缺少的工具；而修辞学要研究“语言·思维”这统一运动中的信息对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作用。

思维是人脑的特有属性，它以语言为工具同客观世界，发生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。语言

的称名功能,是指语言不仅是人类进行思维、认识世界的工具,而且是巩固个人和集体认识成果的物质符号。任何科学都反映在表达概念的语词系统之中。语言又是文学的第一要素,文学家以它型造形象、展现画面、表达感情,创造出诗歌、戏剧、小说、散文等文学作品。所以,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家,把语言列入人类精神文明的范畴,没有语言,就没有文化。

语言不仅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,以其称名功能把认识成果物质化;而且以其指令功能,成为人类改造世界不可缺少的工具。没有语言,人类的生产斗争、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就无法进行,社会就要崩溃。所以斯大林说:“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们脱出动物界,结成社会,发展自己的思维,组织社会生产,同自然力量作胜利的斗争并取得我们今天的进步的力量之一。”^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,特别是电子科学的发明和运用,信息论和控制论影响着语言学的研究。在物质、能量和信息三者之间,人们日益认识其本质,并将它们之间的转化,运用于实际。通过电子科学的处理,人们可以把载荷着人类认识成果的信息,作为指令输出,把科学知识的精神财富,转化为物质财富。我们对马克思的名言“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”的理解,除了原来所说的精神生产存在于特殊的物质——语言之中的含义外,还有把语言信息转化为能量的新内容。语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指令功能,已开始由“间接作用”,发展到“直接作用”了。现代信息论,用数学方法来研究语言,其目的是通过电子计算机,来充分发挥语言的指令功能。当然,作为人类社会特殊社会现象的语言,还有另外一面,即它同使用者的历史联系,它表情功能的复杂性,它对人们的心理影响,它在美学上的作用,等等,都是很难用数学表达的模型来说明的。这些方面,修辞学研究大有用武之地。

语言有统一着的称名功能和指令功能,关系到怎样理解修辞学的功用。难道“最大的功能是在使人对于语言文字有灵活正确的了解”^⑧就够了吗?修辞学要把语言信息加工得精确,具有科学性,取得“以真慑人”的效果;把语言信息加工得合理,具有逻辑性,取得“以理服人”的效果;把语言信息加工得生动,具有艺术性,取得“以情动人”的效果。因此,必须在“语言·思维”的统一体上,建立新的修辞学。

首先,要把语言学纳入思维科学范围中去。钱学森同志在《系统科学、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》^⑨中指出:“逻辑学、形象思维学、灵感学都是属于思维科学这一科学技术大部门中的基础科学。至于诸如语言学、文字学、密码学、人工智能、计算机软件技术、图象识别技术等等,似乎都可以当作思维科学体系中的应用技术,属工程技术类。”修辞学是研究自然语言运用的,当然应当属于“应用科学层次的思维科学”^⑩。其次,能否以逻辑为基础的问题。钱学森同志认为:“有的同志说思维、思维学的基础是逻辑。我看这些同志是不是受了古典思维学说定义的影响。古典定义为逻辑和逻辑学是唯一的思维规律,人的思维,就是逻辑,就是抽象思维,……我们当然不同意这种看法,……把人的思维仅仅看成抽象思维是不对的。”^⑪如果我们先明确,思维包括抽象思维、形象思维、辩证思维和灵感思维等;逻辑也包括形式逻辑、辩证逻辑、描述逻辑和包括指号学和方法论在内的语言逻辑等;那么,我认为修辞学可以建立在这种“广义的逻辑”的基础之上。因为思维是人类特有的也是共有的能力。怎样运用民族语言来进行思维和表达思维,正是我们要研究的重点之一。例如所谓“积极修辞”中“逻辑律所未能推定的”夸张、拈连等,“仍然是在运用逻辑,所说看来违反逻辑,实际上是超出了形式逻辑,而运用的是辩证逻辑。”^⑫

前面讲到修辞过程处于信息编码阶段,但人类认识世界不是被动的,而是能动的。人脑接收信息和加工信息,同计算机不完全一样,人以音节语进行思维,第二信号系统在整个认识过程中都积极地起着作用。例如当我们触到火,感到疼时,掌握了语言的人,“火”与“疼”

这两个词在我们感知时，就同感知对象及感知发生了联系。当我们听到“火”这个词的语音，或看到“火”这个字形时，由于第二信号系统建立在第一信号系统基础之上，并协同发生作用，“火”这语音或字形，就能唤起记忆：一方面与“火”这概念相对应，一方面与以前所获得的“火”的形象信息相对应。人接收形象信息和语言信息即进入感受阶段，由感受器官将信息传入大脑，进入对应阶段。对应得是否恰切，由同感受阶段的反馈来调整。再进入推理·想象阶段，对信息进行加工，这时抽象思维、形象思维、辩证思维，有时还有灵感思维，有侧重地相互配合地活跃起来，第二信号系统的词起着抽象和显象作用，把加工后的思维基本成果，巩固在语言的深层结构之中。培根的名言“修辞的优劣是将推理加入想象而动人意志”^③的成功与否，是真知灼见。推理·想象是否满意，由同对应之间的反馈来调整。然后进入转换生成阶段，把思维基本成果，从语言的深层结构，转化为语言的表层结构。转化得是否恰当，由同推理·想象阶段之间的反馈来调整。最后才进入表达阶段，即通过语符列说出或通过字符列写出。表达得是否臻佳，由同转换生成阶段之间的反馈来调整。这整个过程中，思维主体所产生的四次反馈，可称之为“内反馈”。思维成果进入语言交际，与听阅者，还要产生新的反馈，即“外反馈”，对修辞效果作出反映。对此信息系统，作以下重点说明：

1、修辞过程，存在于人们思维过程中推理·想象和转换生成这两个相继的信息加工阶段之中。在推理·想象阶段，语言主要发挥思维功能，把思维的基本成果，巩固在语言深层结构之中。这是人们形成话语的共性阶段，它具有人类性。思维主体所接收的语言抽象信息，其最小单位是概念；所接收的形象信息，其最小单位是意象。它们被思维主体感知之后，立即同思维主体既存的词汇、形象相对应，取得语言载体、才能进入话语形成的推理·想象思维运动。这时的内部言语具有压缩性和省略性，其运动具有跳跃性和快速性。之所以如此，由于概念、意象同词语的对应，有先有后，会出现概念、意象、词语三者同时并现的瞬间。一旦基本命题确定，概念、意象同词语对应完成，就要进行言语信息的组合，选取主题结构，使新旧信息，根据基本命题的需要，同句子结构取得定位吻合，形成“基本命题十语法结构”的信息方式，把思维基本成果，巩固在语言深层结构之中。不同语言的深层结构虽然不尽相同，但在逻辑上都有相应的内在规律。例如“红豆生南国”（王维《相思》），汉语是“主谓补”结构（“南国”前的介词“于”省略），英语可译为“The red bean grows in southern lands.”或“Red berries grow in southern land.”都是“主谓状”结构。从深层结构看，汉语和英语这两种结构是相应的，它们有着共同的隐性的逻辑特征。

2、思维的基本成果巩固于语言的深层结构，这只是第一步，接着要转换生成至表层结构。表层结构是表示用于交际中的句子形式。它不仅因不同语言，有其民族性，而且思维主体还要根据交际内容同交际目的、对象、范围等需要，考虑语体、人称、同义结构选择、辞格转换、词义感情色彩和形象色彩、语音运用，等等。这不只是语文学问题，而且有语用学问题。例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（李商隐《无题》）中的“丝”是同“思”同音连义双关的。英语如何在表层结构中表达呢？许渊冲同志译为“The silkworm till its death spins silk from love-sick heart.”^④，把“丝”译为“silk”，“思”译为“love-sick”，双关的两方都转换至表层结构。“sick”与“silk”形似，而且开头都是“Si”，同汉语的“si”音节相近，注意到音的联系。如何从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转化，这是修辞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。在转换生成阶段，语言主要发挥表达功能。从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转换，并在转换中继续加工。前一阶段是发生修辞，后一阶段是生成修辞。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修辞现象。

3、在信息加工过程中，“语言·思维”统一体在运动。“广义的逻辑”所关系到的思维内

容、形式、方法和规律，有侧重地、协调地起着作用。思维是一个整体，很难区别什么“积极修辞”和“消极修辞”。《发凡》从记述和表现这两种不同的“表现法式”出发，提出了“修辞的两分野”的修辞学体系，认为“消极修辞是抽象的概念的，积极修辞是具体的体验的”^⑮。从侧重语言表义功能，还是表情功能来看，不无道理。但语言的思维功能和表达功能是统一的，脱离语言思维功能，仅从语言表达功能，是不能正确寻找出修辞与思维的对应关系的。《发凡》不也认为“一切语言文字的意义，平常都是抽象的，都只表示这等概念。……及至实际说话或写文，将抽象的来具体化，那抽象的意义才成为具体的意义”^⑯吗？其实，因“实际说话或写文”而进行的修辞，都是具体的。我们从思维学研究的角度，把人的思维分成抽象思维、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；但在实际的具体思维中，它们是有机关联而无法截然分开的。我同意关于“任何词句总不外要在逻辑上使人有所了解，也要在修辞上使人有所感受”^⑰的观点，没有把修辞分为“消极”、“积极”之必要。

4、至于表达阶段，把“语言·思维”的成果，由内部言语转化为外部言语，即将思维中的语言载体，通过语符列或字符列输出，转化为第二载体，关系到发音程序的形成和语言交际功能的实现，还有一些问题要探讨，特别是谈话、教学、口译、演讲等语言交际的修辞，是应专门研究的，因为这些话语的形成同语言交际功能的实现，往往交叉进行。但对写文章来说，表达阶段，一般已不属于信息加工的思维运动范围了，主要是说话或书写的技术性处理。如果字写得不好，可以用打字机代替，如果口吃或方言严重，可以请人代读。

5、从控制论角度看，人们运用信息时，语言信息是作为自觉信息在思维中运动的。在这运动过程中，每一小阶段，都通过内反馈，以其结果来调整活动的发展，逐层保证信息加工质量和表达效果的最优化。修辞效果的反映，最后要从广大听阅者的外反馈——社会评论取得社会检验，才能知其优劣。思维主体在信息加工时，所考虑的将努力取得的效果，是预计效果。它只有与客观效果取得一致，或客观效果大于预计效果，这种修辞才是成功的；若客观效果小于预计效果，则不能算成功的。

6、对于既成的思维成果进行评析或鉴赏，也必须全面理解作者的完整思维，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，即要从“语言·思维”这统一体的运动来考虑，不然就会出现偏颇的看法。例如华罗庚教授，曾认为唐代卢纶的《和张仆射塞下曲》：“月黑雁飞高，单于夜遁逃。欲将轻骑逐，大雪满弓刀。”有逻辑错误，并写了“北方大雪时，群雁早南归。月黑天高处，怎得见雁飞？”一诗质问^⑱。现在已有同志考证了，当时我国北方边地八月就飞大雪，而大雁八月秋分后，才开始从现在苏联境内的堪察加逐渐南移^⑲。卢纶的诗是合乎抽象思维逻辑推理的。从形象思维逻辑来看，“月黑雁飞高”与“单于夜遁逃”两句联在一起，用的是“比”的修辞手法。并非一定要视觉能实见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中说过“文之思也，其神远矣。故寂然凝虑，思接千里，悄焉动容，视通万里”，怎能说“月黑天高处，怎得见雁飞”呢？卢纶这首诗，在形象思维逻辑上，也是无可非议的。

正因为如此，这种修辞学叫做“逻辑修辞学”，对于使用汉语的人来说，就是“汉语逻辑修辞学”。至此，可以对“逻辑修辞学”作如下定义：

逻辑修辞学，是以“广义的逻辑”为基础，以具体的民族语言的运用为对象，研究该语言信息加工质量和表达效果的过程、方法和规律的应用思维科学。

或许有同志会说：你所说的“逻辑修辞学”是建立在笛卡尔派的普遍语法或逻辑语法基础上的，此路不通！不！普遍语法和逻辑语法，把任何语言的语法范畴，都看作逻辑范畴，而且仅仅是形式逻辑范畴的体现，否认语言的民族性，不关心意识与语言表情的关系，认为语

育有不合形式逻辑的地方，就是不理智，应该消灭。逻辑修辞学并非如此，它是在“语言·思维”统一体的基础上，全面地理解语言的功能，既承认逻辑的人类性，也承认语言的民族性，研究发挥语言的各种功能，提高语言信息的加工质量和表达效果。

或许有同志又会说：你把修辞学扩大为文章学了。没有！文章学研究文章构成的全部，逻辑修辞学，是从“语言·思维”统一体的角度，研究人们思维过程中，如何发挥语言的思维功能和表达功能，以求信息加工质量和表达效果的最优化，即研究发生修辞和生成修辞过程中信息加工的手段和规律。

或许有同志也会说：你不过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一套搬来而已。这话有对的一面，即引进转换生成语法的理论来研究修辞。但有不同：在深层结构方面，语法只从语义学上来研究，修辞则还要从语境上来研究；在表层结构方面，语法只从短语结构类型的组合上来研究，修辞还要从辞格转换，同义结构选择，感情色彩、形象色彩和语音音乐性运用等语用学上研究。转换生成语法与传统语法的出发点不同，前者是造句，后者是析句。修辞是语言的运用，当然要从造句——修辞造句，直至构成修辞篇章来研究。引进乔姆斯基的语法理论，目的在此。

或许有同志还会说：你所说的“逻辑修辞学”不过是把逻辑和修辞加在一起或混在一起而已。这话也有对的因素，因为“语言·思维”本来就关系极其密切，虽然“统一”不等于“同一”，语言和思维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，但有着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。把语言学与逻辑学结合起来，归之于思维科学来研究，正是要研究这种辩证关系，逻辑修辞学不过是这种研究中的一部分。是结合，而不是相“加”，更不是相“混”。

要建立逻辑修辞学，不是轻而易举的，要语言学界，特别是修辞学界同逻辑学界共同努力。以上只是初探，就教于大家。

注释：

①② 二十二所高等院校：《现代汉语修辞学》，第5、11页。

③ 高名凯：《语言论》，第70页。

④⑤⑥⑦⑧ 陈望道《修辞学发凡》，第7、8、17、51、33页。

⑨ 叶圣陶：《谈文章的修改》，1946年《中学生》杂志。

⑩ 朱自清：《新诗杂话》。

⑪ 斯大林：《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》，（见《斯大林选集》下卷，第532页。）

⑫ 《自然杂志》，1980年第1期，第3—7页。

⑬⑭ 钱学森：《在全国思维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》，（见《思维科学探索》）第25、31—32页。

⑮ 培根：《修辞格》，（转引自黄庆萱《修辞学·前言》）。

⑯ 许渊冲：《翻译的艺术》，第67页。

⑰ 李建钊：《逻辑与修辞》，（见《徐州师范学院学报》1979年第1期）。

⑱ 顾迈南：《华罗庚传》，第144页。

⑲ 赵中振：《北方雪天有飞雁——试答华罗庚教授的质疑》（见《羊城晚报》1986年2月11日）。